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2014

记忆叙述、道德能动性与身份建构： 《银翼杀手》系列电影之后人类身份哲思

林伟

(广州中医药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身份认同是《银翼杀手》系列影片的核心哲学和文化议题。两部横跨35年的电影以后人类境遇下传统身体、文化疆界的崩塌为叙事背景, 折射出当下后人类思想论争中的身体/身份话语交锋, 并探讨了语言、记忆和身份叙述在身份塑造和道德能动性觉醒中的关键作用, 从而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身份观及其背后的技术/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影片通过主人公的身份探寻之旅, 展现出身份塑造、认同之流动、绵延的特性, 由此构成了一次思想实验, 将本质主义的“人类身份”观念引向更具开放性的多元化“后人类身份”。

关键词: 《银翼杀手》; 人工生命; 后人类身份; 记忆叙述; 道德能动性

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6)02-0115-07

Memory Narration, Moral Agency,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Post-Human Identity in the *Blade Runner* Film Series

LIN We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dentity stands as the core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issue in the *Blade Runner* film series. Spanning 35 years, the two films use the collapse of traditional bodily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in a post-human condition as their narrative backdrop. They reflect the ongoing discursive confrontations surrounding the body/identity within contemporary post-humanist debates, while exploring the crucial role of language, memory, and identity narratives in shaping identity and awakening moral agency. In doing so, the series challenges the anthropocentric view of identity and its underlying techno-consumerist cultural logic. Through the protagonists' journeys of identity quest, the films reveal the flowing, continuous, and processual nature of identity formation and recognition. This constitutes a thought experiment that steers the essentialist notion of "human identity" toward a more open and pluralistic conception of "post-human identity".

Keywords: *Blade Runner*; artificial life; post-human identity; memory narration; moral agency

收稿日期: 2025-10-0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协同育人项目“人工智能背景下大学英语专任教师职业素养提升路径研究”(231106434135824);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改项目“基于翻转课堂2.0教学模式的医药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研究”(广中医[2023]73号); 广东省高等教育改革项目“AIGC背景下公共英语校本化教学资源的建设与应用——以《大学英语(医学文本选读)》为例”(粤教高函[2024]30号)

作者简介: 林伟, 男, 安徽和县人, 广州中医药大学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为电影、文化、英美小说。

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科幻片《银翼杀手》(1982)被视为赛博朋克电影的先驱之作。影片不仅涉及人机分离、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后人类科技主题,其中杂乱蔓生的未来城市夜幕下阴雨绵绵中的霓虹景观更是成了此后赛博朋克美学的视觉标签。2017年,丹尼·维伦纽瓦拍摄的续集《银翼杀手2049》(以下简称《2049》)延续了前作的叙事和美学风格,并基于彼时科技发展状况,进一步探讨了后人类境遇下的文化疆界纷争和身份认同议题。

在《银翼杀手》系列打造的“高科技,低生活”技术未来中,自然与人工生命的边界日渐模糊,传统文化疆界不断崩塌,人类身份的确定不仅取决于生物学特征,也涉及生物、机械、虚拟、情感和意识之间的复杂纠缠。霓虹灯闪烁、阴雨笼罩的后人类城市中,自然生命体不断消亡,无所不在的人工生命体充斥着未来反乌托邦,就连记忆也被批量生产、移植。两部影片都致力于探索语言、记忆和身份叙述在主体身份生成中的交互建构关系,以及“后人类境遇”下多元化身份建构的可能。

一、灵魂、人类身份与疆界之争

(一)“后人类”对身心二元论的挑战

自17世纪以来,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在西方文化的主体建构思想中占据核心位置。这一学说将生物性身体与超验性意识对立起来,肯定了思维在人的身份建构中的绝对支配性,及其对物质/自然身体的控制权^{[1]183-184}。身心分离哲学观将思想/灵魂视为“人”的本质属性,赋予人类对物质世界征服和开拓的权利,并将其间接地引向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逻辑,默许对自然和他者世界的武力化征服和统治。正因如此,在其后形成的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思想体系中,人类生命经验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与一切非人的生物、机械性存在区别开来。这种二元对立逻辑催生出了不同形态的文化、种族、性别疆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把这种本质主义身份政治称为“疆界之争”(disputed boundaries)^{[2]87}——通过对照他者来定义自我。

随着科技发展,器官移植、人机合体、赛博格等科幻想象日渐进入人们视域。如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

所言,后人类主义已不再是遥远的地平线上的云彩,而是迅速地迫近日常现实^{[3]26}。当下,现代生命科学重新塑造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并不断入侵人的身体和思维,使得传统物种/文化界限日渐模糊。这种“后人类境遇”意味着以人类为中心的本体论面临崩塌风险。

(二)后人类话语论争与新“疆界之争”

在肯定后人类身体蕴含的解放意义的同时,哈拉维指出,由此引发的“疆界混乱”(confusion of boundaries)意味着“科技资本主义需要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来实现对全球化权力的重构,以应对身体/身份在网络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重新定位”^{[2]150}。换言之,通过重新划定疆界,新自由主义科技话语延续了自由人文主义身份政治传统,但现实社会关系围绕着身体生产引发了新的疆界之争。生命科学对身体的干预使得自然/人工、人/机器这样的传统界限趋于模糊,生物医学话语造就了新的身份疆界。在《银翼杀手》系列的后人类宇宙中,被设计、生产出来的复制人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奴工、“假货”(skin job),与自然人对立。

自然人与复制人的身份疆界之争是《银翼杀手》系列最关键的戏剧冲突,这涉及一个终极的哲学追问——何为“人”?复制人是一种与人类几乎无法区分的人工生命体,也是两部影片身份探讨的核心所在。复制人作为后人类社会劳动力的补充被设计出来,从事各种危险繁重的工作,其一旦不听指令或者情绪不稳定,就会被“银翼杀手”追捕并“隐退”(杀死)。影片中,自然人与复制人的“真假”对立折射出后人类境遇下一种潜在的文化焦虑,即后人类思想中论及的“人的终结”观点对传统生命伦理和身份政治的挑战。这并非指现实意义上人的消亡,而是意味着“‘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的终结……也即是‘人类主义’(humanism)的终结,即长期以来对人类力量的绝对自信,以及对人类优越性和独特性的傲慢信念的终结”^[4]。

正是基于这种“人类主义”的终结,西方科幻电影中大量涉及对后人类身份与主体性的探讨,如人工生命、人机合体、身体改良、赛博格引发的身份认同问题。海勒认为,人类身份与身体形态密切相关,“人类”是一个话语建构,其关键

在于我们如何感知和定位自己的身体^{[3]284}。《攻壳机动队》《阿丽塔：战斗天使》《机械战警》《绿巨人》等影片都探讨了身体的“赛博格化”带来的身份撕裂和认同危机问题，而以《美国队长》《钢铁侠》系列为代表的漫威电影则以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姿态，延续着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逻辑，想象着一个“人类与技术融为一体的乌托邦未来”^[5]。《银翼杀手》系列则直面一个本体论议题——何为人类？在后人类语境下，人的本质属性到底是什么？复制人可谓物种疆界模糊、本真丧失的终极体现，但由于身体、身份生产逻辑受制于经济文化状况，他们并未成为哈拉维设想的那种可以弥合传统文化分裂的赛博格，而成了新的文化、种族“他者”的象征。两部影片展现出由科技资本主导的社会架构，其在后人类宇宙中依然划定着泾渭分明的身份疆界，并以人类精神为名，将科技话语用于奴役、剥削复制人。

（三）“灵魂”与人类身份

在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中，人类思维之所以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是因为人类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灵魂^{[1]82}。由于这种“灵魂说”潜在地以西方/白人/男性/基督徒为标准，而性别与种族他者则被放逐于“自然世界”。如此，其也间接地凸显了文化疆界。《银翼杀手》系列的身份分野正是以“灵魂说”为根据的。灵魂是区分自然人与复制人的关键。复制人由于是被制造出来的，而非自然繁衍的，所以被认为是“非真的”(inauthentic)，自然不具有灵魂。就此而言，生育象征着人类身份的社会物质根源，对“灵魂”的执拗则指向后人类语境下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逻辑。

在《2049》中，当K杀死反叛复制人莫顿后，在一棵树下发现了一具复制人女性(瑞秋)的遗体。经过检测，她死于分娩剖宫产。对K的上司乔西队长来说，这意味着区分人与复制人的疆界面临崩塌。乔西队长不顾一切要隐藏这个秘密，因为她认为疆界是世界正常运作的保障，“世界就建立在一堵墙的基础上，一堵分开种群的墙，告诉任何一方墙不存在了，就会引发战争，甚至屠杀”。可见，在影片的后人类宇宙中，物种之间的联系依然被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所规约，这也间接指向了当下科技资本话语背后的西方传统生命政治思维。

当乔西队长发现复制人瑞秋生育的证据时，与K进行了一段对话。K说道：“我从来没有隐退过自然生育的物种。”乔西问道：“有什么分别吗？”K回答：“我想，自然出生就是拥有灵魂。”乔西调侃道：“你没有不也表现得挺好的？”K问：“没有什么？”乔西回答：“没有灵魂。”影片的中心叙事线索是K探寻自己的身份之谜，而这场寻根之旅也是一场寻找“灵魂”、获取社会认同的旅程。影片由此突显出后人类语境下身份的流动性问题，并以此对二元论身份建构逻辑提出疑问，进而为当下社会中纷繁复杂的后人类主义话语提供了一个协商空间。

二、语言、情感与“人类身份”

（一）“基准测试”与情感监控

在《银翼杀手》中，为了控制复制人，当局设计出了心理测试。根据心理测试时复制人与自然人的不同反应，对其进行区分。负责追捕逃亡复制人的“银翼杀手”通过Voight-Kampff仪器监控测试对象在外界问题刺激下的呼吸状况、脸红反应、心率、瞳孔收缩，来判断其是否具有人类的共情能力，即其是否具有“人性”。共情能力以记忆尤其是童年记忆为关键参照。影片开头，复制人里昂被问及母亲时突然失控，因为复制人不具备童年记忆。他们身上凝聚着终极的后人类境遇，即技术对身体的侵入所引发的记忆缺失和身份迷失。Voight-Kampff仪器旨在区分、识别复制人，而《2049》中的基准测试(baseline test)则意在诊断已知的复制人是否正常运作。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被测试者按要求诵读一篇短文，并对其中某个词语段落进行多次迅速的重复；测试者不断插入具有情感暗示意味的干扰性词汇，被测试复制人需要对其作出迅速、冷静的回应，以证明自身正常运作。

可以说，基准测试的理论依据是语言在具体的表述(utterance)中衍生的情感暗示作用。测试以语言回应作为复制人精神世界的指示，旨在对其语言表述中的情感意义进行监控，以确保复制人对语言的把握被限制在其文本结构(textual)层面；而语言具体的语义(semantic)层面对自我意识具有生成和催化作用，因而成为复制人状态不稳定的指示。基准测试正是基于语言的形式和语

义维度之间的互动原理而设计的。语言的形式层面即语法结构和组织逻辑,而其语义层面则指涉着单个词语和句子的具体意义,即个体语义元素如何表达思想观念、信息和情感。在基准测试中,迅速、多次的语素重复可以激发词语的内涵力量,而语词的交叠暗示着单个词语元素不同的意义方向。测试设计者显然认为,语言的文本维度是对现实秩序的遵守,而激活语义维度会促发复制人的情感反应。被精确设计、生产出的复制人应该保持对语言素材的掌控,而避免受到语言多义和情感性的干扰。换言之,在“正常”复制人眼中,语言只是一种工具;不单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一种束缚自我思想的工具。而当复制人的语言反射体现出情感波动和创造性倾向时,其会被视为产品故障。基准测试的目的是确保复制人保持情感稳定,以防他们发展出独立的情感、欲望或意识,而由此引发潜在危险。测试背后的逻辑是维持对复制人的控制,确保他们保持对人类的绝对服从,而不去质疑人类创造者的权威和自我的奴隶身份。基准测试意在维持复制人的“工具化”身份,而不允许其具有独立的欲望和情感。基准测试以语言的工具性为指示,监测和评估复制人的情感和心理稳定性,确保其始终遵循被设定的身份准则。通过定期测试,当局可避免复制人自我意识被激发所导致的逆反情绪。考虑到复制人需要执行的任务往往违背道德和个人意愿,因而,使其保持情感上的超脱对其有效运行至关重要。

(二) 打破身份设定: K 主体意识的觉醒

片中 K 进行了两次测试。第一次,他奉命追杀反叛复制人莫顿,完成任务后回到总部。K 通过了测试,他的回应完全符合为其情感和心理状态设定的基准参数。这表明他仍然在控制之下,情感上超脱,严格遵循指令;他的回应迅速、机械且缺乏情感深度。测试中引用的一段文字出自纳博科夫小说《微暗的火》(Pale Fire)中一首长诗;这首诗以凌乱破碎的时空化文字追溯了主人公动荡的一生。测试者要求 K 多次重复“interlinked”(内部关联着)这个词,然而这个具有感性暗示作用的词语并未激发他的情感波动。而后,随着 K 着手探查自己的身份疑团,他在孤儿院发现了记忆中的小木马,并获知那段童年记忆曾真实发生过。于是,他认定自己便是瑞秋的孩子——那

个“生命的奇迹”和天选之子。在第二次测试中,面对同样的语言游戏,他的语句重复中传达出明显的情感波动和心理变化;他开始经历着身份认同危机,自然生育允诺了他一直求而不得的“灵魂”和人类身份。测试失败标志着他对情感基准状态的偏离,并直接威胁到机构对他的控制的有效性。

《银翼杀手》中的 Voight-Kampff 测试,以及《2049》中的基准测试,都将情感反应和共情能力视为区分自然人与复制人的关键尺度。然而,无论是 Nexus 8 代反叛复制人,还是后来由华莱士公司设计生产出的绝对服从的“好天使”——Nexus 9 代复制人,都具有明显的共情和感性认知能力。华莱士的助手——“最好的天使”Luv 和 K 同属第 9 代复制人,他们在深层认知中都被设定为绝对服从上级。然而,当 Luv 目睹着华莱士冷漠地杀死新生女复制人时,她可以清晰地感知这种痛楚,并为此流泪。K 在杀死反叛复制人时,也真切地感受到残害同类给自己带来的痛苦,然而他们都无法冲破奴役他们的身份设定。作为复制人,他们缺乏的并非共情能力,而是由情感激发出的道德能动性(moral agency),也就是个体依据自身情感经验作出自主抉择的能力。

就此而言,基准测试不仅是一个叙事装置,更是一扇透视语言、情感和个体身份互动关系的窗口。K 在两次测试中间,情感上经历了系统控制与个体自主性之间的冲突。第二次测试的失败是他身份建构的转折点,象征着他从顺从的复制人角色转变为追求自我身份和真相的个体。如果共情能力并非个体自主意识觉醒的关键诱因,那么是什么激活了 K 的主体意识和道德能动性,使他能够违背系统指令呢?

三、记忆、道德能动性与身份叙述

(一) 道德能动性

《银翼杀手》中,“银翼杀手”德卡最终选择带着复制人瑞秋逃离系统掌控,而《2049》则通过 K 的身份疑团,更为深入地探讨了记忆、情感、身份叙述对主体自由意志和道德能动性生成的作用。

在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哲学中,人类精神,即“灵魂”赋予了人类主体性和道德能动性。在《银翼杀手》宇宙中,复制人是基因工程的产物,其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因而一进入世界就已

是成人了。泰瑞尔公司以及后来的华莱士公司在他们脑中移植了人类的记忆，因为“（记忆）给了复制人的情感一个投射对象，这样能更好地控制他们”。复制人的移植记忆既是一种情感参照，也是他们自我身份叙述的框架，以便其能更好地作为工具为社会服务。按影片中科技资本信奉的人类中心主义逻辑，由于记忆是移植的，复制人不具备人类的共情能力——爱与被爱的能力。他们没有灵魂，也无法依据道德理念作出抉择，只能被动地听命于系统。在前传短片《银翼杀手2036》中，华莱士为了展示自己设计的新型 Nexus 9 代复制人的绝对服从力，让其复制人助手进行自残，甚至自杀，以证明他们缺乏自主意识，证明他们仅仅是定制的产品，会永远听命于人类。

如前所述，复制人具有与人类相似的情感反应和共情能力，但缺乏道德能动性来冲破系统指令。M. A. 华伦（M. A. Warren）将道德能动性视为人类身份最关键的标志属性；所谓道德能动性即依据自己相信的价值和信念作出行动的能力^[6]。华莱士对 Nexus 9 代复制人的核心设计创新，就是抹除他们的道德能动性。复制人天生必须无条件服从指令，包括自残、自杀的指令。当乔西队长要求 K 销毁所有复制人生育记录时，K 表现出质疑，乔西怒而呵斥道：“你居然敢说不？”K 回答道：“我不知道自己还有选择权。”乔西满意地说：“这才是好孩子。”可见，与所有华莱士公司生产出的 9 代复制人一样，K 是具有简朴的善恶判断力的。作为“银翼杀手”，他的任务是“隐退”逃亡的复制人。虽然残害同类让他感到歉疚，然而他缺乏足够的道德能动性来冲破设计代码，因为违反、哪怕质疑指令都将被视为产品故障，而面临被隐退的危险。

（二）记忆叙述与身份想象

两部相隔 35 年的《银翼杀手》都在探讨一个本体论议题：“何为‘人’？作为基因工程产物的人工生命到底能否形成人类的道德能动性？”《银翼杀手》结尾处，复制人罗伊在生命终结前选择牺牲自我，救下仇人德卡。这种抉择可被视作主体道德能动性的标志。《2049》则详细描述了 K 主体性觉醒以及之后的道德抉择过程。按照创造者的设计逻辑，缺乏真实记忆的 K 自然不具备“灵魂”，他记忆中的童年是一种情感控制装置，

目的是使他更好地履行职责。但正是这移植的虚假记忆给了 K 共情的起点，使他能自由地作出道德抉择。这说明，自我身份的塑造并不仅仅取决于真实的记忆，其关键在于如何对记忆进行再叙述和想象。K 的自我身份叙述和认同处于不断变化中，其触发点正是一段童年记忆，或者说是 K 如何定义自身与这段记忆的关系。

K 的身份疑团源自他的一段儿时记忆。这段所谓的移植记忆描述了一个孩子在孤儿院中被其他孩子欺凌的情形——他们想要从他手中抢走一个小木马，情急之下他将小木马藏进了火炉中，即使被其他的孩子殴打也拒绝交出。自认为复制人的 K 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段记忆是虚构的。他在莫顿住处发现瑞秋遗体后，在附近一棵树上找到了一串疑似出生日期的数字 6.10.21，而梦中的小木马底部刻的也是相同的数字。这使他认为，这段记忆是真实的，而自己正是故事中的那个孩子，也就是复制人自然生育的结晶。于是，他开始踏上探索自我身份之旅，来到儿时的孤儿院寻找答案。尽管有关记录已经被清除，K 却意外地在废弃的火炉中找到了记忆中的小木马。之后，他来到“造忆师”安娜·斯特林博士的实验室，并得知这段记忆确实是真的，有人经历过这段往事。K 开始深信自己就是故事中的孩子，并非从冰冷的实验室中生产出的商品，而是被爱、被需要的有血有肉的“人”。

安娜在与 K 的对话中透露，创造记忆是一种善行，因为“复制人生活如此悲惨，我没法帮到你们的未来，但我可以赋予你们过去，让你们在回味中微笑”。这番话描述了记忆、叙事与个人身份之间彼此交织的关系。约翰·洛克（John Locke）将记忆视为连续性个人身份（selfhood）的关键^[7]。稳定的、连续性的个人身份需要浸润着情感的记忆。在个人身份塑造的过程中，彼此交叠的记忆犹如安娜创造出的记忆影像，往往被个体依据自身的情感意愿截取、融合成一段完整的叙事，而个体对过去的叙述也影响着未来的抉择。就此而言，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被叙述的过程。K 正是基于对小木马记忆的情感投入，怀疑进而拒绝了复制人身份设定，并为自己虚构出一个全新的身份：作为唯一的复制人的生育结晶，他是独一无二的，是天然的领导者和救世主。

于是,他违背指令,选择叛逃。虽然他最后发现这段记忆是安娜的童年经历,安娜才是那个“生命的奇迹”,但这段以他人视角和体验对真实情景的记录,却能够在主体的身份叙述中形成一种黏合效应。在身份叙述中,即便是亲身体验的真实记忆,也夹杂着彼此交叠的虚构故事片段,正如安娜所言,“真实的记忆都是一团糟”。身份叙述是根据现实需求不断对记忆素材进行筛选、重组、虚构和想象的过程,而正是虚构和想象给了主体身份连续性。最后,幻想破灭的K并未因此回归复制人的默认运行状态,他也拒绝了反叛复制人的邀请而加入叛军对抗公司化资本权力暴政的队伍中。由于小木马记忆在他叙述身份中的共情作用,K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能动性最终被激活,他因此选择了自我牺牲,让德卡与安娜父女团聚。

(三)交互式身份建构

K自我意识以及道德能动性的觉醒,也得益于他与智能AI投影女友Joi的互动关系。Joi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属于同类,他们都是被批量生产出来并履行某种社会功能的科技产品。K负责追捕反叛复制人,Joi则作为虚拟生活伴侣为孤独男性提供慰藉。他们都受到设计编码的限定,却在交流中不断互相影响,并激发出对方身上的自我意识和能动性。影片开头,经过一番搏斗后的K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公寓,这时Joi的投影出现,犹如一个旧式家庭主妇,她设计出精致的食物投影,并不断转换装扮,满怀爱意地与K互动。两人通过互相分享视觉形象、情感和想法,通过角色扮演、语言叙述来彼此建构对方的身份。正是Joi的关爱和鼓励让K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促使他走上身份探索之路。Joi与K的互动说明了社交环境对主体身份塑造的关键作用,而Joi的人工智能属性也指向了新媒体背景下身份建构的多元化特征。

四、从“人类身份”到“后人类身份”

(一)祛魅“人类身份”:道德抉择与个体存在

纵观整个《银翼杀手》宇宙,其中心叙事无不围绕着“人类身份”展开。无论是Voight-Kampff测试和基准测试,瑞秋对童年记忆的执念,K的小木马记忆催发的身份疑团,都投射出影片的后人类社会中的终极二元对立——自然人与复制人

的疆界之争。在两部影片中的未来主流社会中,当权机构都将自然生育和共情能力视为判断人类主体性或灵魂的依据。在这个身体不断被“赛博格化”的社会中,自然生物已然消亡殆尽,而自然人依然坚持着自身的神圣性,将人类生命经验作为准绳,建立起全新的社会架构。然而颇为讽刺的是,自然人表现得极为冷漠无情。泰瑞尔和华莱士两位复制人的创造者都以上帝自居,视其创造出的复制人为工具和工业耗材,这也影射着当下科技语境中“超人类主义”思潮所默许的新的二元论身份逻辑。在《银翼杀手》中,德卡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表现出犬儒的态度。对他来说,追杀复制人就像关掉机器那样简单,而恰恰是在与复制人的接触中,他产生了对自我身份的怀疑。如果瑞秋的移植记忆成为她身份定义的关键,那么片尾德卡门外的折纸和他的独角兽梦境都暗示着,或许他也是为系统服务的复制人,是科技资本掌控的系统链条上的一个微末环节而已。他无力探明和理解所处的环境,最后只能带着瑞秋逃离。这说明“人类身份”在后人类语境下成了一个被科技资本营造的幻象,一个生命政治学的控制装置。片尾,德卡与罗伊的决斗段落充满满宗教仪式感。罗伊在雨中精疲力竭而死,生命结束的瞬间,他选择救下追杀自己的银翼杀手,也因此唤醒了德卡那逐渐消失的“人性”。而后,他如同殉难的天使一样在雨中升入天堂。这也间接挑战了本质主义的人类灵魂说。

在《2049》中,K的身份寻根之旅既是一场自我发现之旅,也是一次对以“人类身份”为核心的西方传统生命伦理的祛魅。为了证明自己是自然生育的结晶、生命的奇迹,K违反了系统对复制人身份的设定,而后却发现这个奇迹另有其人。他强烈的寻根愿望源自对“人类身份”的渴望。然而,正是基于这种情感执念,他证明了自己不但具有共情的能力,也可以依据自身的情感和道德判断作出主体性抉择。或许他并未找到虚幻的“灵魂”,但却因此实现了精神与道德的自由。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存在先于本质”,这意味着个体自出生的瞬间起,就没有预设的本质或目的,其通过自我行为抉择来定义自身。片中,复制人的存在目的被预设为无条件服务人类,然而K的身份疑团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存

在和身份。用萨特的话来说，K 是“被判自由”（condemned to be free）的。正是这种质疑推动他去追寻真相，使他成了一个拥有独立思考和情感行动力的个体。他不再受制于外部规定，而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和信仰来行动。这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的自由和责任。

（二）流动与开放：走向后人类身份

两部影片都通过自然人与复制人的疆界之争，挑战了西方文化中的本质主义身份观。在关于人类身份的探讨中，《2049》保持了前作的开放性，并未对“德卡是不是复制人”这一困扰了观众 35 年的“彩蛋”给出确切的答案，而是延续了前作中关于身份的哲学追问：人与复制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人类身份的终极象征？是灵魂？自然生育能力？共情能力？还是为信仰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

或许，“人类身份”在《银翼杀手》系列影片中并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在疆界模糊、本真丧失的后人类境遇中，如何发掘出一种开放性身份，而不是划定新的疆界，从而继续着以科技资本为主导的西方 / 人类中心主义幻梦。随着科技话语对人的身体和思维的干预程度不断加深，以及新兴媒介对当代人生活的不断渗透，“个体和群体的身份都无法再固守内在的一致性，也不可能现实真空中完成从一而终的、稳定平衡的理想认同”^[8]。《银翼杀手》结尾处，德卡的身份疑团暗示着后人类境遇下虚无缥缈的本真，由此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的身份疆界。《2049》中的身份探索更体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影片中，无论是“好天使”（无条件服从复制人）、复制人反叛者，还是像 K 这样的银翼杀手，甚至像 Joi 这样的智能投影伴侣，其境遇都指向了后人类境遇下身份的流动性。这些被生产出来的人工生命体，在特定条件的触发下，也会产生自主意识，从而脱出系统控制，向权力之外逃逸。K 的身份之旅可谓一则后人类身份寓言，他对自我身份的一再误认和虚构恰恰是他脱离系统掌控、实现自身价值的动因。正如哈拉维所言，后人类 / 赛博格身体挑战了本质主义的身份设定，蕴含着开放性的身份塑造可能，从而超越西方 / 人类中心主义生命伦理。

在一个生命可被人工创造的世界中，“人类身份”到底如何定义？《银翼杀手》系列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而是邀请观众进入一个沉思的空间。影片的叙事模糊性构成了一个哲学思想实验，鼓励观众对本质主义身份观进行质疑。在《2049》上映的 2017 年，其前作中对未来科技的想象已然越来越接近现实。《2049》并未正面揭开德卡身份之谜，而是以更为多元化的视角，将对“人类身份”的本体论追问引向更为开放的“后人类身份”。影片通过 K 的身份之旅说明，身份建构是一个动态、绵延的过程，其间也不存在一个确定的身份“终点”，个体在生命历程中能够不断地根据现实需求和情感投入，对身份素材（记忆、行为、经历）进行挑选、阐释、重构，并不断在确立、修订、重新确立边界的过程中逐步接近对“自我身份”的塑造，《银翼杀手》系列也由此构成了一则凝重的当代身份寓言。随着“后人类”概念渐渐逼近现实，或许更值得反思的身份话题不是“我是谁”，而是“我可能成为谁”。

参考文献：

- [1] 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 [M]. 庞景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2] HARAWAY D. Simians, Cyborg,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M].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1.
- [3] 凯瑟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4] PEPPERELL R. The Posthuman Condition: Consciousness beyond the Brain[M]. Bristol: Intellect, 2003: 171.
- [5] 林伟. 弗兰肯斯坦怪物的银幕显影：西方后人类科幻电影中身体话语的哲学溯源和文化论争 [J]. 科普创作评论, 2024(3): 64-72, 80.
- [6] WARREN M A. On the Moral and Legal Status of Abortion[M]// LAFOLLETTE H. Ethics in Practice: An Anthology. Oxford: Blackwell, 2002: 72-82.
- [7] LOCKE J, NIDDITCH P H.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126-127.
- [8] 赵静蓉.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3.

责任编辑：黄声波